

中欧学者共同研讨欧洲的“7D 框架”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门 镜

2026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与上海欧洲学会主办、上海市社联 2026 年度合作项目及欧盟部分资助的国际会议“欧盟的 7D:跨党派视角与中国因素”在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筹划和组织,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荷兰蒂尔堡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欧洲议会等知名学府和机构的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会。会议共同探讨在全球秩序变动与系统性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内部多元政治竞争与对外关系的密切相关性,从七项欧

盟核心挑战(7D),即债务(debt)、脱碳(decarbonisation)、防务(defence)、民主(democracy)、人口(demography)、去风险(de-risking)、数字化(digitalisation)出发,基于中国视角,深化跨党派与跨区域互动中对欧盟转型及中欧关系的理解。

在开幕致辞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教授指出,来自不同国家、学科与政治立场的学者齐聚上海,本身即体现了“跨边界对话”的意义。他认为,“7D”已不仅是欧盟内部政策议题,而是当代欧洲政治与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他借用“纠缠”概念,强调债务、脱碳、防务、数字化与去风险等议题之间高度相互关联,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欧盟当前的“去风险”实际上反映出面对复杂全球相互依赖关系时的深层焦虑,而中国已深度嵌入所有“7D”议题之中。最后,

吴冠军将本次会议形容为一个“思想风洞实验室”,不同观点在碰撞中推动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新思考。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指出,“7D 战略”反映了欧盟在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变化与全球秩序重构背景下面临的“结构性同步压力”。债务、脱碳、防务、民主、人口、去风险与数字化并非孤立议题,而是共同构成新的欧盟治理逻辑,并相互嵌套、彼此影响。他特别强调,“可持续性”已超越传统环保概念,成为欧盟重构长期韧性与制度稳定性的核心目标。中国已深度嵌入欧盟关于经济安全、技术依赖与战略自主的讨论之中,而不同欧洲政党和国家对“7D”问题也存在不同理解与政策排序。因此,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讨论政策本身,更在于分析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重新定义这些问题,并通过学术交流增进理解、缩小分歧。

本次会议共有三位主旨发言嘉宾。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弗兰克·施米尔芬尼格围绕国际秩序变化下的欧盟政治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重点分析了欧盟边界治理的长期演变。他基于 1980 年至 2024 年的 EUROBORD 大型数据库指出,欧盟边界不仅是地理边界,更包括人员、商品、技术与制度规则等功能性边

界。冷战结束后,欧盟经历了明显的边界开放过程,但近年来,国际秩序变化并未导致“欧洲堡垒化”或欧盟解体,而是推动欧盟形成“差异化边界治理”模式。欧盟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明显收紧边界,对乌克兰则快速开放,而对中国采取介于开放与限制之间的审慎策略。这说明欧盟越来越依据安全、制度与价值认同标准,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程度的边界管理。同时,尽管欧盟不断讨论战略自主与地缘政治能力建设,但核心财政与军事权力仍主要掌握在成员国手中。

丁纯教授在点评中高度评价了施米尔芬尼格教授基于 EUROBORD 数据库开展的边界治理研究,认为其从“边界形成”而非单纯“一体化”角度理解欧盟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当今欧盟边界治理已从服务市场开放逐渐转向强调经济安全,“去风险”、投资审查与技术限制正改变边界性质。结合中欧关系现实,他强调,尽管欧盟对华边界有所收紧,但中欧经济相互依赖仍持续深化,因此必须从全球价值链与互动关系角度理解欧中关系。

在第二场主旨发言中,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德斯蒙德·迪宁从历史长时段视角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挑战。他指出,欧洲一体化并非历史必然,而是在特定国际环境下形成的政治选

择,并将其划分为战后重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期,以及当前“一体化再确认”三个阶段。迪宁强调,美国长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但特朗普主义兴起后,美国对欧盟的态度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当前欧洲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同时,俄罗斯安全威胁、中国崛起与全球竞争也推动欧盟重新思考安全与防务能力建设。他认为,欧盟未来将走向渐进、灵活与差异化发展。尽管面临危机,欧盟仍是欧洲国家集体行动与维护国际影响力不可或缺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教授在点评中结合个人观察与时代变迁,对欧盟发展与中欧关系进行了评析。她指出,中国学界过去常认为欧盟“每经历一次危机便前进一步”,但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忧欧洲是否会“越来越糟”。中欧曾在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化理念上存在广泛共识,但当前地缘政治竞争与美国政策变化使这种氛围明显改变。中欧政治结构差异正在加深彼此理解难度,因此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持续国际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研究员在第三场主旨发言中围绕跨大西洋关系演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冷战时期欧美关系建立在共同安全威胁基础之上,但冷战

结束后,随着欧盟东扩、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欧美之间逐渐出现深层战略分歧。冯仲平强调,特朗普时代尤其是“格陵兰危机”极大动摇了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也推动欧洲加速思考防务自主与2030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未来欧洲防务合作将更加灵活与多层次化。在此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尝试重新加强对华经济合作,以扩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

除了主旨发言,本次会议一共收到13篇论文。其中,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围绕战略自主与欧盟对华政策政治化展开分析。她指出,“战略自主”已从传统防务领域扩展至经济、技术、数据与产业链安全等多个层面。欧盟战略自主同时指向中国与美国:一方面,欧洲担忧在关键技术及供应链上对华依赖加深;另一方面,特朗普时期,美国单边主义也削弱了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信任。欧洲主要党派对华讨论已从人权与贸易问题,逐渐转向经济安全、技术竞争与“去风险”。她的报告清晰展现了当前欧洲对华政策政治化、安全化的发展趋势。中国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传统外交与经贸议题,而正在逐渐演变为欧洲内部党派竞争、战略自主讨论以及全球地缘政治重构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周秋君与硕士研究生廖正杰围绕特朗普 2.0 背景下欧洲议会中的北约叙事及其对欧盟对华战略的影响展开分析。其指出,当前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本质上反映的是“谁来保护欧洲”以及“欧洲是谁”的身份政治分歧。欧洲议会主要政治力量的北约叙事可概括为“大西洋主义者”“战略务实主义者”与“激进修正主义者”三类,不同阵营对中国、美国与欧洲战略自主存在不同理解。欧盟对华“三重定位”长期存在,正是因为其战略模糊反而能够平衡内部政治分歧。当前欧盟对华政策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高调修辞不断升级,但始终缺乏真正统一的战略方向。

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纪韶融博士围绕“7D 战略”与中国维度展开分析。他指出,“7D”并非真正统一的欧洲大战略,而更像是一套反映欧盟现实压力的“指标体系”与“压力地图”。在纪韶融看来,当今欧洲政治的核心分裂已从传统左右翼之争,转向“欧洲主义”与“主权主义”之间的对立。在中欧关系中,“去风险”“防务”与“民主”是最关键的三个方面。其中,“去风险”因其战略模糊性而成为欧洲内部能够接受的共同语言。他认为,中欧未来既不会完全融合,也不会彻底脱钩,关键在于建立理解彼此制度逻辑的“制度共情”能力。

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宋黎磊教授围绕欧盟绿色转型中“脱碳”与“去风险”的矛盾展开分析。她指出,欧盟虽然致力于通过绿色转型实现气候目标与战略自主,但在太阳能、电池、稀土等关键绿色产业链上高度依赖中国,因此“去风险”政策不断加剧这一结构性张力。宋黎磊进一步分析了欧洲主要党团在“去风险”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欧洲人民党党团强调产业安全与竞争力,社会民主党党团关注公平转型,绿党党团则在气候合作与对华规范压力之间呈现矛盾立场,而右翼保守力量甚至将“去风险”与反全球化、反绿色转型相结合。中欧绿色关系正从过去的开放合作,逐渐转向有限合作下的可控竞争。

同济大学王传兴教授围绕德国选择党(AfD)在德国国内与欧洲议会中的双层移民政治展开分析。他指出,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是选择党迅速崛起的关键背景。AfD 从边缘抗议力量逐渐发展为德国重要政治力量,并不断重构“谁属于德国”的身份认同边界。移民问题不仅是政策议题,更是选择党动员社会焦虑与文化不安全感的重要工具。在欧洲议会层面,AfD 逐步从保守右翼转向更激进的主权国家党团,显示其正成为欧洲极右翼网络的重要组织者。不过,AfD 同时面临民族主义立场与依赖欧洲议会

平台之间的内在张力,其未来究竟会进一步“欧洲化”,还是继续服务于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政治,需要持续观察。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研究生迪塔·托斯卡围绕“全球门户”的政治经济学展开分析。她指出,“全球门户”不仅是一项对外基础设施与投资战略,更是欧盟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乌克兰危机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背景下,对自身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进行重组的过程。托斯卡认为,“全球门户”体现了欧盟将发展援助、贸易、投资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地缘经济化”趋势,同时也推动了欧盟对外融资体系与财政工具的整合。它实际上是一种“财政欧盟化”过程,通过强化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及欧洲金融机构的协调,重新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内部整合。不过,欧洲内部围绕该战略仍存在明显分歧,其未来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内部政治格局的发展。

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何樱灏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邢瑞磊教授围绕欧盟对华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度化展开分析。其指出,尽管欧洲议会日益碎片化、右翼力量上升,但《外国补贴条例》《反胁迫工具》《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涉华经济安全法案依然获得广泛的跨党派支持。其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安全”已逐渐

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语言与治理逻辑。中国不再仅被视为贸易伙伴,而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供应链、技术与制度竞争中的“风险来源”。不同党派虽然支持的理由不同,但最终围绕“去风险”形成稳定联盟:欧洲人民党党团强调战略韧性,社会民主党党团关注产业保护,绿党党团则强调供应链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安全”正逐渐成为欧盟重新理解中国与全球化的“新治理秩序”的逻辑起点。

蒂尔堡大学扬·雅普·德·鲁伊特教授围绕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伊斯兰议程”展开分析。他指出,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极右翼力量已不再仅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试图从内部“重塑欧盟”。法国国民联盟、荷兰自由党、德国选择党与西班牙呼声党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倾向于不仅将“伊斯兰”视为宗教问题,更视为与“欧洲文明”及“民主价值”相冲突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移民与穆斯林群体被不断安全化与文明化,成为欧洲社会焦虑的象征对象。当前欧洲真正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移民管理,而且是如何在安全焦虑、身份政治与民主原则之间维持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宇慧围绕西欧中间派政治的兴衰展开分析,并提出“人口离心力”与“空间脆弱性”概念。她指出,2014—2019

年间,中间派力量主要在大都市外围与中等密度区域扩张,这些地区居民教育水平较高,但政治认同感较弱,容易被欧洲一体化、气候与数字化等议题动员。然而,中间派本身高度依赖人口结构、组织网络与政治参与,一旦出现人口外流与组织衰退,中间派便迅速萎缩。2019—2024年间,曾推动中间派崛起的地区也最先出现极右翼与反建制力量上升。陈宇慧认为,欧洲政治正在出现“空间空心化”,未来中间派将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都市核心区域。

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处政策分析师拉尔夫·德拉亨贝格博士围绕欧洲政党格局变化与欧洲理事会战略重点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他指出,欧盟当前政策优先事项的变化,越来越受到成员国政党结构与联盟政治变化的影响。过去由中右翼与中左翼主导的稳定两党格局正在削弱,多党联合政府日益普遍,极右翼与保守右翼也逐渐进入执政联盟,并开始影响欧洲理事会内部权力平衡。在此背景下,欧盟的核心议题正从市场整合与规范性价值,转向竞争力、安全、防务与经济韧性。因此,如今的欧盟越来越像一个“政党化的政府间联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廖佳教授与硕士研究生马梦晨围绕欧盟数字治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展开分析。其指出,欧盟数

字政策已从早期的数据隐私保护,逐渐转向强调“数字主权”与技术安全。《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及《人工智能法》等法规,使欧盟数字监管显著加强,并形成具有域外效应的“布鲁塞尔效应”。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治理结果,也反映了欧洲议会内部党团围绕竞争力、安全与数字权利的政治博弈。基于2009—2024年中国对欧出口数据,她们发现,数字监管越严格,中国企业面临的合规与技术适配成本越高。制度差距正逐渐取代地理距离,成为影响中欧贸易的重要变量。

都柏林大学学院博士后乔瓦尼·帕伦特围绕欧盟对华海洋政策的演变展开分析。他指出,海洋安全已成为“7D”议程中防务、去风险与数字化等多个维度交汇的重要领域,也是观察欧盟对华战略变化的“压力测试场”。随着红海危机、海底电缆安全与港口投资问题升温,欧盟越来越将海洋空间视为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既是全球航运与港口网络的重要参与者,也越来越被欧洲视为潜在战略风险来源。欧洲议会内部则形成三种主要叙事:欧洲人民党党团、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团强调“战略威慑”,社会民主党党团与复兴欧洲党团主张“合作性风险治理”,绿党党团则从“生态安全”视角关注气候与海

洋治理。不过,不同党团之间正逐渐围绕“去风险”形成新的共识。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姚旭与硕士研究生何文翔围绕欧盟数字主权与对华政策展开分析。其指出,《数字服务法》虽然在法律设计上强调“来源中立”,但在实际执行中,对 TikTok 与 Meta 却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政治处理方式。TikTok 逐渐被欧洲议会塑造成“民主安全风险”,而 Meta 更多被纳入消费者保护与市场治理框架。这种差异反映出欧洲议会内部围绕“中国背景”与“民主脆弱性”的身份政治动员。他们提出了“规则武器化”概念,认为原本中立的数字监管工具正在被转化为地缘政治“去风险”工具。欧盟数字治理已不仅是市场监管问题,而越来越成为战略自主、民主防御与对华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会议总结环节,门镜教授指出,“7D”不仅是七个政策领域,更是观察欧

盟结构性转型的重要窗口。贯穿债务、脱碳、防务、数字化与去风险等议题的核心逻辑,是“相互依赖的政治化”。欧盟在主动重新定义全球化,并进入一个“政治化治理”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安全、技术与外交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会议讨论表明,欧盟并非沿单一路径发展,而是在不同政治力量的竞争、协商与妥协中不断重塑。同时,各方正逐渐形成一些共同底线,例如反对全面“脱钩”,并探索“可管理的相互依赖”模式。目前,欧盟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如何在世界中行动,而跨学科、跨国家的对话对于理解这一历史性转型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门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紫江特聘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责任编辑:宋晓敏)